

題本身就是中古史一個重要方面，就中古歷史非常重要的禮制而言，作者探討禮制對於外來宗教的制約和容納，這就提示我們研究中國禮儀不能僅僅局限於文獻，更不能局限於儒家經典和官方文獻，甚至不能局限於中土材料。在中古中國，禮制、禮儀的存在和發生作用的形式不一定是按照禮書或官方或地方或家族的規定而一成不變。禮制對異質傳統的節制、改造、容納是其存在和發生作用的重要形式。

綜觀全書，我們可以說，姜先生在本書中運用的研究方法，既非單純的西方傳統的藝術史研究方法，也非單純的中國傳統史學和藝術風格學方法，而是建立在「二重證據法」這一史學方法基礎上，有選擇地借鑒西方藝術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並進行變通，對傳統藝術風格學研究進行創造性發展的新的圖象證史研究法。對歷史研究而言，作者圖象證史，是對近代中國積累的史學研究方法的繼承、發揚與豐富，足可啓示方來；有關入華以後的祆教藝術史探討為外來文明本土化這一歷久彌新的重大課題的後續研究提供了一個經典的範例；對於藝術史研究而言，則向學界展示了一個歷史學家治藝術史的獨特視角與方法，體現出一個年過六旬的學者不懈的學術追求與創新精神。

吳羽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民俗曲藝·天災與宗教專輯》，臺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2004年3月，386頁。

宗教是一種較為普遍的天人關係理解方式，在人類歷史上，天災的發生催生出各種特定的禳災儀式，已有的宗教也被運用到防災和救災工作之中，宗教在人類與天災之間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是，以往學界對天災預防和救治的研究，多偏重於禦災技術策略的具體實施以及國家、社會的賑濟工作，對於災害應對在人類宗教行為中的體現，着墨甚少。《民俗曲藝》雜誌第143期「天災與宗教專輯」對此課題進行了一次集中的探討，無疑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專輯共收入中、英文論文九篇，內容涉及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其他地方性神祇信仰，在時間上跨越了傳統與當代兩個時段。透過豐富的文獻資料和大量第一手田野調查材料，人類在天災面前多樣的宗教實踐躍然紙上。中西方學者對不同宗教經驗的細緻描摹，展示了其間大量的細節和差異，進

而向讀者引申出一個更為深入的議題：不同信仰代表了對人地關係的不同理解，對天人互動的不同理解理所當然會孕育出方式各異的應對措施，面對共同的災害危機，不同宗教的教義、儀式及其相應的社會功能之間，宗教與官方意識形態之間，以及宗教與科學技術措施之間，會是如何競爭、衝突，或是並存、重迭呢？

當我們集中閱讀、對比該專輯的論文時，便能從學者們細膩的描繪中找到問題的一些答案。蘇堂棟（Donald S. Sutton）的“Prefect Feng and the Yangzhou Drought of 1490: A Ming Social Crisis and the Rewards of Sincerity”〈明代地方官的祈雨靈應與社會危機：馮郡守與1490年的揚州大旱〉以及寇雷蒙（Raimund Th. Kolb）的“A Ten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Locust Plague Control in Qing China (1644–1911)”〈試論清代中國治蝗整體脈絡中宗教的角色〉，分別對宗教與行政、科技等禦災手段的共存方式做了恰如其分的展示。儒學是中國傳統時代的官方統治學說，行政上的救災措施實際上體現了儒家對人地關係的理解。馮忠作為揚州知府【編者將Prefect Feng譯為「馮郡守」，然明代地方官的正式稱謂中已無「郡守」一詞，按原文所示，馮忠出任揚州府的行政長官，應為「馮知府」。】，理應嚴格依照官方禮制進行相應的祀典，然而，緊迫的乾旱危機已造成地方社會的人心動盪，掌理一府行政重任的馮知府為祈天降甘霖，保一方太平，以私人身份虔誠地參拜了地方神祇五司徒廟。幸運的是，久違的雨水也在此後及時而至，地方社會的危機由此而漸得平息。作為一名儒家意識形態政府的行政官員，馮知府的參拜行為，對其身份而言，並不合適。但是，他的這次祈雨活動成功化解了地方的社會危機，履行了他作為地方行政長官的應有職責，穩固了他的行政權威，獲得了僚屬及地方人士的認可和贊許。當時的知識分子從儒家理學的觀點出發，認為馮知府以其個人的勤勉和至誠，修身自律，成功地實現天人的和諧統一，完成了自己應有的職責，與儒家經典要義正相謀合，儒家官員公開參拜地方神祇的「出格」行為，得到了學理上的認證。地方信仰與官方意識形態，雖然在天人關係的理解上存在着微妙的差異，但在天災危機面前，互補共存，並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融合。

有關劉猛將、八蠟等蝗神信仰，學界已有較多的論述，寇雷蒙一文重新梳理了清代和民國各地重要的蝗神信仰以及慣常的蝗災預防和補救措施。地方官員和知識分子在抗擊蝗災的鬥爭中積累了寶貴的禦災經驗，編訂成專門的技術手冊，總結了防蝗和治蝗的工作流程，論文作者從多種官箴書和文集中心細爬梳了這類手冊。有意思的是，作者發現，在這些手冊中，從蝗蟲生

物學特性出發的技術手段和祈求蝗神佑助的宗教儀式並行不悖，都是蝗災抗擊工作中的必要程序。而且，由於當時人們對蝗蟲的生物學特性所知尚少，技術性的手段仍不足以有效地防範和救治蝗災，人們還是將求助蝗神的儀式視為比生物技術更為有效的禦災措施。一般民眾，甚至具備一定救災專業知識的地方官員和知識分子，依然將蝗災視為德政實施與否的表徵，民眾救災信心的有效樹立主要依賴蝗神儀式而非生物技術。從生物特性出發的救災技術是對致災原因科學把握的產物，科學也是對人與自然互動關係的一種理解方式，寇雷蒙的論文對宗教與科學兩種救災手段的並行狀態做了有意義的探討，科學技術力量尚顯不足的時代，宗教更能有效地建立起大眾的救災信心，動員群眾的抗災力量，甚至科技手段的實施仍須在宗教儀式的裝飾下方能為群眾所信任。

除了宗教與官方意識形態和科技之間的並存和競爭外，不同宗教團體為謀求自身影響力的擴大，在救災過程中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安特利婭·楊庫（Andrea Janku）的“Sowing Happiness: Spiritual Competition in Famine Relief Activities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種福：十九世紀末中國賑饑活動中的心靈角力〉和王世駿的〈921震災後基督教在南中寮地區的傳佈〉分別展示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末兩次災後救助工作中宗教團體的競爭場面，古今對比之下，令人深思不已。

19世紀70年代，華北地區遭受慘酷的丁戊奇荒，西方教會以及東南富庶地區的士紳階層同時展開積極的賑款籌集工作。教會借此作為傳播福音的手段，中國的士紳則利用佛教的「因果報應說」來推動募款工作的展開。西方教會的傳教活動，對地方士紳來說，是一種爭取民心所向的思想挑戰，雙方竭力通過對災民的直接援助來擴大各自的影響力。新聞報紙對募款成績的渲染報導，加劇了雙方的競爭力度，而19世紀下半葉緊張的中西關係，又令這場募款競賽帶上了一層微妙的中西民族競爭意味，一時間，宗教、世俗和民族之間的角逐交織在了一起。在競爭中，西方教會組織展示了社會動員的強大能力，中國的佛教組織以及其他賑災力量無法與之相匹敵，國內的有識之士為此而檢討與反思，論文作者據此推測，這次中西賑災角力或許就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佛教復興」的動因之一。

楊庫的論文以一種旁觀的比較視角論述了賑災中的宗教競爭，而王世駿的論文則偏重於從基督教一方來透視賑災中宗教競爭的展開。1999年9月21日，臺灣中部發生強烈地震，臺灣的基督教團體立即成立救助協會，進駐災區救助災民，同時開展宣教工作，擴大教會力量。為在與佛教、道教等宗教

團體的競爭中取得傳教優勢，基督教各宗派互相合作，成立高效率的震災救援技術隊伍，在賑災實踐以及與其他宗教團體的競爭中及時檢討改進自己的工作。他們引入專業的心理療救手段，並適合當地民情，對教義的傳播方式進行一定程度的變通，從而取得傳教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在現代救災技術發達的條件下，宗教已並非災區救援工作中的主導力量，救災技術的實施也不再必須借助宗教的裝飾，而宗教在災區的傳播活動反而更多利用了科技的輔助手段。

徐宏圖的〈火災、瘟疫與道教煉火儀式〉對浙江省盤安縣深澤村每年農曆九月初九重陽節夜晚舉行的煉火儀式做了全景式的描繪，參照老人訪談和鄉土文獻，並與歷史上其他地區相似儀式的模擬，作者從防火、防疫兩個角度闡發了煉火儀式的現實意義。段友文、高忠嚴合作的〈抹不掉的集體記憶——山西祁縣昌源河的洪澇災害與民俗調查〉，結合民間文書、碑刻和口述材料，描述了明清至民國年間昌源河的洪澇災害及其相關的村落慣例、水規水法、用水糾紛和水神信仰等民俗現象。岳永逸所作〈對生活空間的規束與重整——常信水祠娘娘廟會〉，介紹了每年農曆五月廿七前後在河北趙縣常信二村舉行的水祠娘娘廟會。結合當地的自然環境、經濟產業以及人居模式等社會背景，作者指出，目前廟會在這一帶村落的興旺是當地自然、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每年按時舉行的廟會，有着相對固定的參與村落範圍，昭示了村民生活的行進節奏，是對村民生活時空的儀式性約束。最後，李宗益的〈新莊地藏庵文武大眾爺禳災儀式的轉化〉梳理了1912年至今臺北縣新莊文武大眾爺出巡儀式的演變歷程。這一儀式最初是為緩解疫情危機而舉行的應變式禳災儀式，在危機度過之後，逐漸演變為每年例行的預防性儀式。1979年以後，出巡的組織者將生動的戲劇肢體語言、化妝技巧和一些民間法術的祝呪、靈符融匯入出巡的表現形式中，禳災儀式的民俗表演意味日漸濃厚。

以上四篇論文展示了現代社會中禳災信仰的存在狀態：宗教儀式的應急救災功能大為減弱，隨着科技的進步，人們對天災的成因和變動規律有了日益準確的認識，以科學方法高效率地救助災區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是，目前的科技水平還未能做到對所有天災的精確預期，人們畏懼不定災害的心理尚不能完全克服，對災後民眾心靈創傷的撫慰也沒有十分有效的科技手段，具有民心慰藉功能的宗教信仰依然有其存在的心理需求；現代社會中，宗教在天災應對中的作用已大大降低，但由禳災儀式衍生而出的一些其他社會功能卻適應了新的社會需求，在傳統儀式的舉行中日益強化，並隨現實的需要

而發生一定的嬗變，現代社會中，宗教儀式業已演化為地方社會的凝聚中介和民俗文化的宣傳載體。

此外，專輯中李泰翰的〈清代臺灣水仙尊王信仰之探討〉也對例行常祀的水仙尊王信仰與由此衍生的划水仙儀式做了預防性和應急性的區分，並指出水仙尊王信仰的崇祀活動與臺灣海峽的風暴週期有着緊密的對應關係。

宗教體現了人類對自身與自然之間關係的理解，歷史上，宗教曾長期是人類應對天災的主要措施，天災與宗教之間的互動歷史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認知進程。《民俗曲藝·天災與宗教專輯》對該課題進行了一次有益的研究努力，論文中豐富的實證材料向讀者展示了該視野下多樣生動的人類生活畫卷，同時也令我們不由發出對這些場景所知尚少的感歎。僅僅本專輯中所揭櫫的實證材料以及由此而觸發的學術思考，便有許多是作者和讀者此前所未能考慮到的。在此意義上，對該課題而言，本專輯的問世還遠不是一個圓滿的終結，但作為一個深具啟發意義的有益開端，卻是當之無愧的。

鄒怡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黃應貴，《人類學的評論》，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96頁。

本書是臺灣人類學家、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所長黃應貴的個人論文集。作者從自己人類學觀點出發，對臺灣人類學（狹義的人類學，即文化人類學）以及相關學科的課題與成果進行了深入的評論，在展現、檢討人類學在臺灣發展軌跡的同時，力圖說明人類學的特點，及其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中的位置。我們比較熟悉的臺灣人類學發展過程中的許多重要學者（如王崧興）、計劃（如「濁大計劃」）、觀點（如「土著化」）、會議（如「社會及行為科學中國化」討論會）、課題（如社會運動），以及人類學的一些趨向與分支（如「歷史人類學」）等，在書中都有獨到的分析。

除序言外，本書共收入以下11篇論文與2篇附錄，分別為：〈光復後臺灣地區人類學研究的發展〉（1984——指最初發表時間，下同）、〈人類學與臺灣社會〉（1995）、〈王崧興先生的學術研究〉（1997）、〈戰後臺灣人類學對於臺灣南島民族研究的回顧與展望〉（1999）、〈幾個有關人類學在臺灣之發展的議題〉（1999）、〈東埔社布農人的新宗教運動：兼論